讲讲喝咖啡

任溶溶

我曾经是个咖啡迷，一天早中晚要喝上三顿咖啡。回想我解放前不热衷于喝咖啡。我读书的大夏大学在南京西路重华新村梅龙镇楼上，弄堂口两旁就是咖啡馆，我从不进去。大学毕业后偶进南京东路沙利文，总是喝牛肉茶而不是喝咖啡。我早上常去凯司令，也只是喝红茶。当时凯司令的服务非常符合英国习惯，红茶用小锡壶装，不时来加开水，一上来就在桌上放一个多层盆子，每一层放着不同的西点，顾客爱吃哪种西点自己拿，吃多少算多少钱。当时在凯司令饮早茶的名人不少，如老画家颜文樑，周围总聚集着好多位求教者，还有老歌唱家葛朝祉等。

我迷上咖啡应是在我1952年参加工作以后。我喜欢开夜车做翻译工作，早晨不能睡懒觉，起来就想喝点醒脑的东西，于是一早就上咖啡馆。

那时候南京西路铜仁路西首有一家CPC咖啡馆，双开间门面，里面还有咖啡“工程师”，生产罐头咖啡。那位师傅是广东人，正在研究生产速溶咖啡，只是尚未成功。这家咖啡馆只供应咖啡，点心仅有吐司和鸡蛋三明治，我的早餐也就解决了。我星期一到星期六天天早晨上那里，我天天看到著名剧作家艾明之同志。

我在咖啡馆还有个习惯。我翻译诗总是把整首诗先照意思译下来，写在小纸片上，带在身边，到咖啡馆后一边喝咖啡一边按原诗格律推敲，译成诗。有一些急就章也是在那里写的，如我创作的童话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。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钱景文同志约我把在少年宫讲的故事赶快写出来，她的杂志已发排，特地把版面空出来等我的稿子。我于是早上在CPC咖啡馆花了半个钟头左右写成了，因为故事已讲过不止一遍，不用多想。

这家CPC咖啡馆后来改为咖啡厂，搬到了延安西路近法华镇路，即上海咖啡厂。过了好长一段日子，在该馆原址附近铜仁路口，开设了上海咖啡馆。铜仁路与南京西路交界的这家店原是卖进口油漆的店，门口上方有一个在倒油漆的大油漆罐，很醒目的。我于是又上这家店喝咖啡，一直喝到“文革”开始。最后一天晚上我还到那里喝咖啡，外面队伍在游行，而第二天经过这家店，只见整个门面贴满大字标语，写着“打倒裴多菲俱乐部”。

回过头来说，在CPC咖啡馆消失期间，我喝咖啡换上了中央商场内一家美心咖啡馆，它在弄堂里，对着德大饭店的后门。店主夫妇以及工作人员都是广东人。是现成煮的一杯杯咖啡。我在这里交了不少朋友，最熟的是《新民晚报》的张之江同志。还有一位在日本留学回来的教授，“文革”期间在别处还见过他一次，他缺钱买一样什么东西，我正好有那么点钱，给了他。现在他不知怎么样了。“文革”前夕搞社教运动，资方代理人要集中起来检查。一天早晨我去该咖啡馆喝咖啡，还是店主招待，给我煮咖啡，我只觉得他印堂发暗，很紧张的样子。晚上下班我又到那咖啡馆去，里面气氛很紧张，店主的岳父也来了，说店主失踪。第二天我再去，得知店主在厕所内自杀了，这厕所是不对外开放的，中央商场店家专用。我自然很难过，没再去过。这咖啡馆随后结束，并入附近的东海咖啡馆。“文革”后我见过店主的夫人，她还好。

“文革”期间我喝咖啡到八仙桥黄金戏院西首柳林路口一个饮食店，这饮食店等于许多饮食摊集合起来，既卖生煎馒头、粢饭油条，也卖咖啡。咖啡还是一小壶一小壶现煮的。这期间我拿生活费，零用钱不多，只能在香烟与咖啡间作出选择，结果宁愿喝咖啡。我一早五点多钟就到那里，一个人静悄悄地读外文，朋友来了就聊天。许多咖啡迷都集中到这里来了。有我的翻译界老朋友吴元坎，有《新民晚报》的著名作家姚苏凤，我想他该靠了边。我也是靠边的。但在这个地方不管，造反派与牛鬼蛇神一起喝咖啡聊天。我还看到造反派押送挂着牌子的走资派来吃点心。后来我发现，人真是聪明，牌子给改成折叠式，走资派就拿着折起来的牌子由造反派押着来吃早点，造反派也一起吃。“文革”开始时我在这里喝咖啡，但后来不行了，当中又去了干校，但“文革”后期我回到上海，成了人民出版社的译文编辑，重新来这里喝咖啡，还是一早五点多钟到，学外文，然后聊天。这样一直到进译文出版社。

译文出版社在延安西路铜仁路，南京西路铜仁路口的上海咖啡馆又开张了，我重新光顾上海咖啡馆，反正上班下班都路过。后来译文搬到福州路，不去那里了。再后来，上海咖啡馆原址建大楼，也搬走了。

之后我就是喝速溶咖啡。现在到处能买到速溶咖啡，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还买不到，我出国访问，或去香港、深圳，回来的行李总是一大瓶一大瓶速溶咖啡。海外朋友知道我热爱咖啡，除了送我咖啡，还送我咖啡壶、咖啡粉碎机，我都不用，因为懒，喝速溶咖啡就心满意足了。不过我希望喝到外国名牌速溶咖啡，总是托海外亲友买。一直喝到前年生了一场病。病后忽然不想喝咖啡了。于是跟相交半个世纪的咖啡说再见。

世象杂谈

让孩子正常成长

倪既新

看了一部调查“开发右脑潜力培训班”骗局的电视片，不禁思潮起伏。那些行骗者，为谋钱财，不惜祸害孩子，理当惩处；但那些期盼孩子成龙成凤，“心切乱投门”而上当的家长，也应冷静反思：真有能“点石成金”的培训班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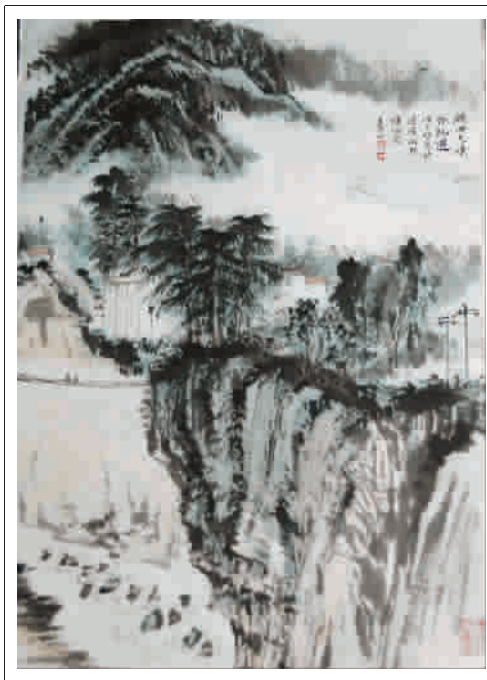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这么感慨，是因为今年暑假未始，有朋友引两位家长约我，委托疏通关系，让他们的孩子进某个人满为患的智力开发特训班：“人家都在补习培训，我们总不能只让孩子看蚂蚁、捉蝴蝶吧？”我知道，这种恳切的语调，这种虔诚的目光，只有父母为孩子祈福时才会闪现。而正是面对这样的表述和眼神，我说不出一句违心话来让他们欣喜与安慰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：我非但没有这种门路，更想奉劝他们，让将上小学的孩子多些自由玩耍的时间……

眼前父母，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成功超群。为达这个目的，时下流行的方法，就是拼命给孩子加餐：厚重的营养进补，超量的知识灌输。可惜，我们时常见到与愿望相悖的结果，譬如肥胖男孩胸前挺突的女性乳房，在校学童普遍的厌学情绪。那么，我们是不是走进了一个误区，一个迷魂阵？

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，社会上风行过一种“宝宝素”。来电视台做广告的厂商说词诱人：这从未及孵化的鸡胚里提取的高级营养物质，对促进儿童智能体能发育极有好处。但结果，按例服用的幼儿，全都患了性早熟！当时这事给了我强烈的警示：凡是违反人体自然发育规律的外界干扰，就如拔苗助长，有害而无益。生理如此，心智难道不一样吗？

与此相对照，正常的成长却能成就真正的英杰。譬如张香桐和谈家桢，都是世界著名科学家，都健康活过一百岁。要论“起跑线”，他们却都输人一大截：童年艰难困苦，张香桐14岁才上小学一年级；谈家桢能一个咸蛋度三餐就算好日子。看来很明白，正是早年的苦难磨练了他们的意志，造就了他们坚强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，才最终使他们成为贡献社会流芳后世的杰出大师。

我没有理论，说的全是真实的经历和切身的感受。两位家长首肯我说得“有道理”，还同意我举他们的例子给其他人听。但时至今日，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“hold住”环境的压力。我真心希望，那个活泼可爱的六岁男孩，双休日能睡到自然醒，傍晚能在小区绿地踢球奔跑，能有兴趣蹲下身来静看蚂蚁搬家，能专心思考随时冒出的奇怪问题：蚂蚁不穿衣服怎么不冷？蚂蚁没有手机怎么联系集合？蚂蚁不靠汽车怎么能搬动比自己大的东西？同时，还能劝阻旁边的小朋友别拿开水冲、别用脚踩它们……我相信，这样的孩子，长大了可能会更有出息，会真正幸福和快乐。



浙西大峡谷 （中国画） 赵养正

美国的中国导游

袁念琪

“在家里做饭的，请举手。”声音从车厢前面传来，大巴已开出洛杉矶的唐人街，奔向拉斯维加斯。在美国的半个多月里，参加了两个旅游团，这是第一个，叫“海鸥假期”。

说话的是邱导游。他无意让大家比拼厨艺，而是从厨房烧菜后余味绕梁不绝，引到行驶中我们别用大巴上的厕所。说那个收集排泄物的容器靠近尾部的发动机，工作的发动机是滚烫的，就会在封闭的车里散发异味，如同工作后的厨房，但味却大不一样。

也是关照这事，在纽约参加的第二个团的女导游就没那么委婉了。“纵横四海”戴眼镜的伊凡直接宣布不能用，说着，把她放在座位上的外套一拎，丁零当啷掉出一地硬币。

她第一天就迟到。按规定，导游应当与游客住同一酒店，同社另一男导就这样。大家等了近一小时，露面的她没一句道歉。而在“海鸥假期”，第一天上路不久，大巴发电机坏了，只能等旅行社换车。为此，邱导不仅道歉，还加了个景点。伊凡也有加菜的。当车过“911”遗址，她出四题，为什么恐怖分子不袭击帝国大厦而是世贸中心？为什么世贸中心的人们纷纷跳楼？……没人与她互动。

伊凡是比较“糨糊”的。把洛克菲勒将土地一美元象征性卖给联合国说成一分钱算是口误，把原文几千年前印地安人来这里译为成吉思汗时期还能算口误？在费城，说自由钟旁的厕所原是华盛顿办公室；而厕所墙上那块图文并茂的牌讲述的是厕所由来。

在华盛顿的游船上，正说河那岸是.专门培养将军的罗斯福军事学院，两架直升机轰鸣着掠过头顶。喇叭里响起伊凡的声音：你们真幸运，刚才飞过去的是副总统。她继而解释道：飞过一架是巡逻，飞过两架是副总统，飞过三架是总统。那么，飞过四架是谁来了？难道是上帝么？

伊凡比较靠谱是常拿美元做道具：在大都会的埃及馆，叫大家掏出一美元敲背面的金字塔。在费城又让摸出100美元，这回看两面，看正面起草《独立宣言》的富兰克林，看反面费城独立纪念堂。到国会大厦，再翻寻50美元，那背面有国会山。

听听伊凡口吐莲花倒也算了。没想到她是刀子嘴加刀子心。收了每人192.5美元的门票钱，说给清单，可从第一天直到在水牛城解散都没见这张单。连续三顿晚餐，都拉到她的关系户。这一切，在洛杉矶团是没有的。

据美国商务部旅游观光办公室发布的数据，中国大陆自2011年起就成为美国排名前十的旅游客源市场之一。去年来美的大陆游客108.9405万人，排第九。以36%同比增长成为美国旅游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国家。如此看来，伊凡要少，邱导要多。因为邱导在途中还是让两位游客用了大巴上的厕所，在发动机热乎乎工作的时候。

“老王”就医

刘凯军 刘建华

我们的父亲刘飞在战争年代，历经了无数次残酷的战斗，六次负重伤，屡建战功。

1939年9月21日，我新四军“江抗”在江阴顾山与反共顽固派“忠义救国军”的遭遇战中，敌人已先我占领了山头制高点，战斗异常激烈。父亲带领部属强攻山头，在带头冲锋中，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胸，当即鲜血从口鼻涌出。由于子弹头紧靠心脏，直到1984年10月父亲逝世，才将这颗镶在父亲体内45年，已经锈蚀斑斑的子弹头取出。1990年代初，母亲把这颗子弹头捐赠给将建成的苏州革命博物馆。在父亲去世的日子里，父亲的部下写了不少他们亲身经历的纪念文章，蒋游叔叔写的父亲化名为“老王”在上海治伤的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篇。

那是1939年冬，负伤后的父亲伤势严重，伤口发炎化脓，药品奇缺，在陈毅亲自过问下，经上海地下党安排，由护士长张晨亲自陪伴，住进了四川路和九江路口的一所美国圣公会办的同仁医院。公开身份是张晨的远房亲戚，化名“老王”，受伤的原因是在种田时被流弹所伤。

当时日军进攻武汉，沿途烧杀扫射，一个农民被流弹打伤，是毫不奇怪的，更何况父亲还是张晨护士长的“亲戚”，所以，对他的伤因，没有人怀疑。经医生诊断，父亲胸部镶有一颗子弹头。因子弹头紧靠心脏，伤口感染，体质弱，需卧床治疗，待伤情恢复到一定程度，再确定是否手术。

所谓卧床治疗，就是患者的治疗、饮食、大小便等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卧床条件下进行。父亲住院近三个月的时间里，再大的病痛他也乐观对待。当给他治疗时，他总是微笑着点头示意；当给他倒水送饭时，他总是微笑着说：“好！好！”当照料他大小便时，他仍是微笑着说：“我自己来”，“谢谢”。医院对卧床患者大小便的护理，是每天定时送大小便器，父亲很注意这方面的配合，尽量不给医务人员增加麻烦。每当咳嗽时，父亲始终遵守医嘱，用手按着胸部，轻轻咳嗽。创口疼痛加剧时，他用手按着胸部，轻轻喘息，从未哼过一声。当护士询问他是否胸痛时，他还是微笑着回答：“还好。”父亲清澈明亮的目光，流露着感激之情。他始终面带微笑，使护理过他的人有亲切、和善之感，加上说话简朴，面有皱纹，皮肤棕黑等等，病房的医务人员都相信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伤员。

父亲住院期间，除了医院里有地下党的同志暗中保护，上海地下党还经常安排一些同志分别前去探望，每次有人探望，虽然互不相识，父亲和来探望的同志都配合得很默契。他们机智、灵活，演绎得天衣无缝，让周围的人确信父亲是有亲友在上海的，不至于产生任何怀疑。一天下午，蒋游在病房值班，朱先骏来探望父亲后，悄悄地告诉蒋游说：“四床的伤员‘老王’是新四军里的一位领导人，是打日本鬼子负伤的，你要好好照料。”蒋游惊喜之余默默地点点头，心中既敬佩父亲的军人品格和工农本色，又为能亲自给抗日将领护理伤情而高兴。他暗暗地下决心，一定要保护、护理好这位抗日将领。

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，父亲的伤口已愈合，子弹头被结缔组织包裹，因靠近心脏，做开胸取弹手术有危险，医生建议待弹头外移至浅表组织时，再取出。父亲不久就出院重返抗日前线。

1942年，当朱先骏同志（即朱萍）领着褚文禄（即褚杰）、蒋游参加新四军，父亲来到旅政治部驻江都县境的十八旅卫生部看望新同志时，他们才知道，曾在H病房第四床住过的农民伤员“老王”，原来就是刘飞同志——我们敬爱的父亲。

陈毅伯伯曾对我说：“你爸爸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，很有才华，《新四军军歌》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集体创作的。”

十日谈

父辈的信仰

赠人俚句六首

谢春彦

西安画家王家春君亦好子恺夫子艺，奉题

爱君纸上日初升，有意丹青不意禅。

天教因缘缘艺起，王家春色秀长安。

书赠成都画友蔡寅坤

野风堂上几度钟，鸟不朦胧月不弓。

浩唱锦官雄气起，丹砂一定十分红。

题吴君大壶文集《荡漾时代》

荡漾之时荡漾吟，当风吴带作画身。

煮茶论道寻常事，手举大壶去灌春。

题赠友人册子

我有幽幽旧梦，纷纷堕落花间。

茫茫无可寻处，偶或心中一潺。

寄远

无计从心头去，有风自故乡来。

故乡之水污矣，岂止为鱼一哀。